
立高怀远：汉代西域使者与边疆经略^①

李 斯

内容提要：考察汉代边疆经略的历史进程，西域“使”的作用值得重视。汉代使者立高怀远的人生追求，反映出雄健有为、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汉代西域呈现“三绝三通”的复杂态势，体现两汉西域经略理念与具体方式的差异。如何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考验历任西域经略者的行政智慧和管理才能。汉代西域使者的人生浮沉与历史评价等问题也值得后人深思。

关键词：汉代 西域经营 国家战略 使者 边疆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21) 01—0059—08

DOI: 10.16363/j.cnki.xyyj.2021.01.007

汉代西域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而且逐渐成为多样化的族群交往和文明互鉴的历史舞台，见证了中华文明不断进取开拓的辉煌历程。^②考察汉代边疆经略的历史进程，西域“使”的作用值得重视。两汉王朝关于经略西域指导理念、具体措施和成败得失等方面的差异，也由“使”的历史活动与人生浮沉得到部分体现。对相关史实的探讨，或许有助于增进汉代西域经略史、民族关系史和社会风俗史等方面的认识。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边地出土文献所见秦汉使者研究”（项目批准号：16FZS005）阶段性成果。

② 关于汉代史籍中“西域”所指的具体地理范围，学界普遍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理解。广义“西域”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区域，狭义“西域”似仅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又有学者对“匈奴西域”与“西域”名义等概念加以重新阐释和辨明，相关论点既不囿于中原本位的地域观念，又可与传世文献和新出考古资料相互参证。关于广义和狭义“西域”概念的考察，参见：杨建新《“西域”辨正》，《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第24～29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6页；刘宾《古代中原人的西域观念》，《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第28～39页；贺灵：《西域地名的文化意义》，《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第48～54页；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二编下篇第十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3页。关于“匈奴西域”及其相关概念的新近研究，参见：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0～105页，收入氏著《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孙闻博《〈史记〉所见“匈奴西域”考——兼论〈史记·大宛列传〉的撰作特征》，《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第28～40页；刘志平《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西域”认知》，《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第41～53页。

一 “立功绝域”：西域史上的英雄时代

中华文明在汉代展现出更加宏大和开阔的气象，英雄人物风起云涌。关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鲁迅先生曾写下“遥想汉人多少闲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等语句，后人由此得到重要启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①“多少闲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等语也反映出雄健有为、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

考察汉代经略西域的历史进程，“使”的作用值得重视。^②西汉初期因“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而形成的相对松弛舒缓的社会节奏，至汉武帝时代已切换为更加明快流畅的乐章。张骞“凿空”西域的成就，不仅引发后继“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而且实际开创了汉代西域经略史上首个英雄时代：

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贵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③

据《史记·大宛列传》等相关记载，张骞“凿空”之后出使西域者络绎不绝。“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反映使团人数和规模已颇为可观。“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则体现出使距离和空间范围的显著扩大。

司马相如在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年）因“通西南夷”之事上书汉武帝，其中特别提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关于“非常之事”，《史记索隐》引用张揖的解释，“非常之事，其本难知，众人惧也。”^④类似表述亦见于二十多年后的汉武帝诏书中，《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106）求贤诏：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斫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⑤

“非常之事”与“非常之功”即“使绝国”，此等历史重任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实现。关于众多使者远赴“绝国”的不同历史表现，固然受限于各人主客观条件的差距，但尝试模拟张骞的成功轨迹应是重要心理驱动之一，这也得到了最高执政者的正面支持。

我们又能够看到，汉代使者在谋求财产增值和阶层跃升等世俗理想之外，还具备更为高远的

① 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213页。

② 参见：李大龙《西汉的郎官及其在治理西域中的作用》，《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第89～94页；李大龙《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述论》，《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第67～75页；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第40～46页；薛宗正《西汉的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05～110页。

③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0页。

④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50页。

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页。

人生追求，反映出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据《西京杂记》记载，以汉使身份名震西域的傅介子，少年时“尝弃觚而叹”：“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①与“傅介子弃觚”故事类似的还有班超“投笔从戎”故事：“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②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汉代锦绣图案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等文字，宋明诗文也常有“登高明”等语，或许可以视为当时使者出行心态的生动反映。^③汉使陈汤在“出西域”时有别于常人的历史表现，“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④关于“登望”，《后汉书·梁竦传》又写作“登高远望”：“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⑤通过阅读“不乐本土”“登高远望”等语句，我们不难感受到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和博大胸怀。

上述诸人的出使表现与历史活动，体现出时代使命和个人追求的相对契合。范曄在《后汉书·西域传》卷末对西域使者筚路蓝缕的历史功绩予以高度评价：“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⑥“致远之略”和“封侯之志”等评语，仿佛时代大浪潮激荡之下的一朵小水花，折射出绚烂多姿的壮丽光彩。无论古今中外，将个人理想与国家事业相结合，在完成时代使命的基础上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都应被视为合情合理的有为之举。在“绝域”三十余年，因“年老思土”上书乞归的班超，曾写下“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等语句，最高执政者阅后“感其言”而召还。^⑦班超八月回到洛阳，九月病逝。对于班超人生最后时刻的感言，后世诗人或有不同理解。唐人戴叔伦《塞上曲》写道，“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以身许国和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不仅长久激励仁人志士，而且成为历代文学中咏唱不休的经典主题。汉代使者能够战胜常人难以想象和视如畏途的艰难险阻，勇于探索未知世界，建立不朽功勋，立高怀远的人生追求或许起到了重要的驱动和支撑作用。

二 “三绝三通”：汉代西域的复杂形势

张骞出使西域，本以与大月氏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匈奴为主要目的。尽管匈奴以其强盛兵势持续对西域施加军事、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影响，“汉使”与“匈奴使”在西域的竞争甚至一度相当激烈，但汉武帝时期实际已出现“西域内属”的有利形势。关于汉代西域经略情况的发展脉络，《后汉书·西域传》有如下表述：

① (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8~129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1页。

③ 王子今《登高明望四海》，《光明日报》2002年8月6日，收入氏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0页。

④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第3010页。

⑤ 《后汉书》卷三四《梁竦传》，第1172页。

⑥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31页。

⑦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83~1585页。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①

所谓“三绝三通”，其时间范围主要涵盖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西汉哀、平之世，中央王朝对西域控制和影响能力骤减，西域“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便是明证。王莽篡汉不仅导致“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而且客观上造成西域“并复役属匈奴”的严重后果。

东汉建立后，不堪匈奴役使的西域“皆遣使求内属”，其后百余年间，“背叛”与“复通”成为东汉西域经略史上交替出现的两种态势。对于这一复杂历史情势的持续原因，已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探究。^② 尽管部分相关讨论仍有进一步斟酌的空间，但可以明确的是，历代王朝多少都从“三绝三通”的史实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清人诗云“一家经咒出天方，伯克司城纳税粮。万里尽归都护节，三通三绝笑延光。”^③ 其中似乎隐约流露出某种“后见之明”的历史优越感。有论者将“三绝三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东汉时期由西汉的“开拓”转向“保守”的意见，或许也还有重新加以审视和讨论的必要。^④

被视为东汉“中兴”之主的汉光武帝刘秀在明确拒绝西域各国“内属”请求时，给出的理由是“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其后史籍更有对当时具体情势的记述：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遣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⑤

西域十八国为表示诚意，“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甚至于“及得见，皆流涕稽首”的表现，在史家笔下显得颇为真切，其请求借助汉王朝影响力以脱离匈奴役使的决心与愿望可谓相当强烈。此事发生于建武二十一年（45），距东汉开国虽已超过二十年，刘秀所谓“力不从心”等语当有确指，似乎不能全然视为脱离实际情势考虑的遁词。《资治通鉴》在引述此番言论后，又加入

①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09~2912页。

② 参见苗普生《略论东汉三绝三通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56~63页；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24~27页；李大龙《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18页；刘国防《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第53~60页。

③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178页。

④ 吕晓洁《汉唐王朝的西域政策与文化交流》，《中州学刊》2015年第7期，第126~129页。

⑤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4页。

“班固论曰”等一大段文字，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后世史家的治史态度和评价标准。^① 其史源依据当来自于《汉书·西域传》赞曰：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②

如果能够自觉排除传统中原本位主义的影响，或许对于所谓西域“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的认识，还有再加讨论和辨明的必要。《诗经》有云“无言不讎，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动辄以“兵众”“小邑”“大国”等客观因素作为“因时之宜”的参照标准，恐怕不仅无从彰显“盛德在我”的观念自信，而且更无意中透露出某种空谈“威德”的自欺之感。

西汉初年至“文景之治”时期所积累的财富对西域经略固然起到了重要支持，但仅以国力强弱作为考察和评价相关举措的主要标准，却是我们始终难以完全认同的。如果认真考虑“弃轮台之地”“下哀痛之诏”等语的具体历史背景，或许有助于深化相关认识和理解。有关汉昭帝即位之初的天下形势，班固直言不讳地指出“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③《汉书·西域传》可以看到对“海内虚耗”的真实成因的解释“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④反映出汉武帝后期因西域经略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财政困难和社会危机。直到东汉，“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等功利主义倾向仍然在朝野舆论中具有相当影响。关于“西域”战略意义与区域形势等认知理念上的较大分歧，实际对东汉重新经略西域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

三 “荡佚简易”：东汉经略西域的新局面

西域“复通”之后的东汉建初三年（78），班超充分考虑到复杂多样的区域形势，提出因地制宜的战略构想，以求长久平定西域：

“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降反。若二

① 《资治通鉴》卷四三《汉纪三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1403~1404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8~3930页。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3页。

④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2页。

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幹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幹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①

班超上书得到最高执政者的赞赏和支持，但朝中对于拨给兵卒的具体数量仍然存在分歧。从班超在西域三十余年的经历来看，得到来自中央王朝的实质支援并不算多，甚至可以说为数很少。所谓“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等语并非夸张，其自信能以少数兵力实现“西域平定”的宏大意图，应当主要归功于“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等切合实际的战略设计。

关于班超经略西域的超常理念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功，时人及后世多予以正面评价。然而，一部分历史学者对此也不乏批评和贬抑之辞。王夫之的意见堪称典型：

汉之通西域也，曰“断匈奴右臂”。君讳其贪利喜功之心，臣匿其微功幸赏之实，而为之辞尔。夫西域岂足以谓匈奴右臂哉？班固曰：“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与之进退。”此当时实微理势之言也。

抑考张骞、傅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将不过数十人，屯田之卒不过数百人，而杀其王、破其国，翱翔寝处其地而莫之敢讎。若是者，曾可以为汉而制匈奴乎？可以党匈奴而病汉乎？且匈奴之犯汉也，自辽左以至朔方，横亘数千里，皆可阑入，抑何事南绕玉门万里而窥河西？则武帝、张骞之诬也较著。光武闭关而绝之，曰：“东西南北自在也。”灼见其不足为有无而决之矣。

夷狄而为中国害，其防之也，劳可不恤，而虑不可不周。如无能害而徼其利，则虽无劳焉而祸且伏，虽无患焉而劳已不堪，明者审此而已矣。宋一亡于金，再亡于元，皆此物也。用夷攻夷，适足以谓黠夷笑，王化贞之愚，其流毒惨矣哉！^②

张骞等人仅率领“数十人”“数百人”就能够成功“伏西域”，实际反映了当时西域出使环境的极端恶劣程度。匈奴不断凭借其强盛兵势对西域施加影响，阴谋袭击和武力刺杀等特殊方式成为使西域“使”争雄竞胜的重要手段，但并不能由此反推出西域诸国无足轻重的结论。因此，过于严苛的道德要求恐怕不适宜作为相关历史评价的参考标准。

班超以其久在西域的深厚历练和丰富经验，对于继任西域都护就西域经略的总体指导理念曾有“简易”“严急”之分辨：

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③

① 《后汉书》卷四七《班梁列传》，第1575~1576页。

② 〔清〕王夫之撰；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六·光武·三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53~154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七《班梁列传》，第1586页。

任尚以“严急”导致“西域反乱”，更反映出班超经略西域的成功绝非偶然，其指导理念与具体模式被实践证明确实可行。关于“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的认知，应当源于长期仔细的实地考察。这一审慎客观的态度才是保障西域长治久安的可靠基础。如何把握“宽”“严”之间的合适尺度，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考验着历任西域经略者的行政智慧和管理才能。

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荡佚简易”以及“宽小过，总大纲”等行之有效的策略方针，对后世应对类似复杂多样的民族情势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诸葛亮凭借“心战为上”而成功平定南中，可能也得益于相关启示：

《襄阳记》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谲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谲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①

应当承认，马谡提出“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等建议不仅暗合“用兵之道”，而且对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持续经营和长久安定也是适用的。

在今天的成都武侯祠前，仍然留存清人赵藩的一副对联，可视为历史镜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这样评价诸葛亮“治蜀”的功绩“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有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②如果联系诸葛亮平定南中“攻心为上”的史实，可知其“治”的成功实际来源于“审势”之“识”，似乎也与班超经略西域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此，王夫之《读通鉴论》亦有一番论述颇堪玩味“班超以简，而制三十六国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诸葛孔明以严，而司马懿不敢攻，姜维师之而终以败。古今异术，攻守异势，邻国与夷狄盗贼异敌。太史公之右广而左不识，为汉之出塞击匈奴也。温公之论，其犹坐堂皇、持文墨以遥制阉外之见与！”^③“以简”“以严”并无固定标准，应当注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四 结语

清代学者赵翼不仅注意到“汉使立功绝域”这一历史现象，而且尝试对其事功予以评述，相关论说意见体现出两汉时期的明显差异。由于西汉时期“汉之兵力实强”，加上“其时奉使者亦皆有胆决策略”，故常常可以看到“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的历史记载。

①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983~984页。

②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934页。

③ （清）王夫之撰；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54页。

例如，西汉“以单使立奇功者”有傅介子和文忠，“擅发属国兵而定乱者”有常惠，“用便宜调发诸国兵以靖反侧者”有冯奉世。赵翼总结西汉使者成功原因，特别提到“汉之威力，行于绝域”，加上“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体现国家力量与个人才能的结合。西汉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嫫以“公主使”身份出使西域，深受敬爱，被尊称为“冯夫人”，也是汉使凭借“汉之威力”于西域展现个人才能的生动史例，更能够反映当时“不惟朝臣出使者能立功”，女性使者“亦仗国威以辑夷情矣”。然而，赵翼在述及东汉使臣时却只提到班超父子事迹，提出“班氏父子之功”“更优于西汉诸人”的论断。^①考察汉代经略西域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史家重西汉而轻东汉的叙述倾向，但“班氏父子之功”“更优于西汉诸人”等认识却体现出更为宏大开阔的历史视野，值得重视。

然而，对于班超自西域归来后的人生境遇，后人不乏有为其鸣冤抱屈者。《后汉演义》写道“夫苏武归而仅为典属国，班超归而仅得射声校尉，至病逝后，并溢法而且斩之，汉之薄待功臣久矣！无惑乎李陵之降虏不返也！”^②其中将苏武、班超作为“汉之薄待功臣”的代表，虽属小说家言，亦反映出一定的史识。

历代诗文多有将苏武、班超并提，抒发有关人生浮沉的愤懑之情。唐人诗云“剑刃秋水鬓梳霜，回首胡天与恨长。官竟不封右校尉，斗曾生挟左贤王。寻班超传空垂泪，读李陵书更断肠。今日灞陵陵畔见，春风花雾共茫茫。”^③以“班超传”“李陵书”并举，发出类似“李广难封”的千古怨叹。尽管英雄如班超者很可能未必有“恨”，甚至于宁“恨”无悔。但这种质朴情感的传递，却隐然寄托了普通民众对于西域英雄人物和英雄时代的怀念与追忆。元人诗云“西域风尘汗漫游，十年辜负旧渔舟。曾观八阵云奔速，亲见三川席卷收。烟锁居延苏子恨，云埋青冢汉家羞。深思篱下西风醉，谁羨班超万里侯。”^④所谓“苏子恨”“汉家羞”等语，恐怕不止是单纯基于对仗的用词。如果联系到以“守节不屈”而著称的苏武，自西域归来后曾经历上层政治斗争而被免职的史实，或许会对“回首胡天与恨长”等诗句所要表达的复杂情愫有更为真切的感受。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诗穷而后工”的传统影响。历代诗文对苏武、班超等悲剧人生的同情，似乎也可理解为诗人自怜心态的流露。^⑤相比之下，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英雄人物，实际上是其文明发展程度与历史认识水平的客观反映。

（作者单位：湖南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56~58页。

② 蔡东藩《后汉演义》，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

③（唐）贯休著；胡大浚笺注《贯休歌诗系年笺注·卷第二十一·灞陵战叟》，中华书局，2011年，第917~918页。

④（元）耶律楚材著；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卷三·过云川和刘正叔韵》，中华书局，1986年，第60页。

⑤ 王子今《说唐诗“苏武”咏唱》，《湖湘论坛》2013年第5期，第55~61页。

Pursuing a high and long-term ambition: The envoy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Li Si (59)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Han dynasty who tried to implement diversified administrations with ethnic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envoys had played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e envoys of the Han Dynasty pursued a high and long-term ambition in their lifetime, reflecting a vigorous and enterprising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morality.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dynasty presented a complex situation of "three interrupts and three links", reflect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s and specific methods of management for the Western Reg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ies. How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releva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will test the administrative wisdom and management skills of every Western Region Governor. The up and down of life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these envoy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are also worth pondering.

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Western Regions; Envoys; Frontiers

On " One marquis in the northwest" :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on the policy-making
o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Han dynasty

Wang Zijin (67)

Abstract: In the management of frontier affair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Northern Front" was prioritized concerned due to the strong pressure from Huns. After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Hexi, the Han culture expanded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demand for expansion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immigrants moved south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t was a new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and the national economic center began to shift to the southeast.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uth Ocean Waterway for the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had also made the strategic path to the southeast oceanic out regions more important. The so-called " One general in the southeast", " One marquis in the northwest" and " Marquis for the north", " General for the southeast"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c direc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policies for the Western Regions changed. After Ban Chao " Ding Yuan (stabilizing frontier regions",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again.

Keywords: Han Dynasty; Northwestern frontier; One general for the southeast; One marquis for the northwest; Han Emperor Guangwu; Ban Chao; Ma Yuan

Pearls and Jingjiao (Nestorianism) :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image of the cross

Yao Chongxin (81)

Abstract: Many religions incorporate pearls into their image system, giving them special religious implications. Through this study, 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the Persian church seemed first to incorporate pearls into its sacred decor themes, and then pearl elements began to appear in Persian Christian art. This tradition was inherited, developed by the Nestorians who later entered Persia and finally made the "pearl" and the "Maltese cross" in a "fixed match", forming the unique style of "Syrian-Persian hybrid cross" specifically used for Jing Jiao (Nestorianism) . This has spread widely in Oriental Jingjiao propagation areas, which has been evidenced by numerous images of this cross found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The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pearls/pearl elements and Jingjiao art is also clarified. To the west, this tradition, to some extent, had an influence on Byzantium, inspiring the use of pearls and pearl elements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 art. The pearl element that appeared in the Jingjiao decor art is the result of various causes. While becoming a decorative element of the Jingjiao art, the